

论新中国粮票制度的兴废

张艳国 彭白云

摘要:从1955年新中国发行粮票,到1993年废止粮票,粮票及粮票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存在了近四十年时间,我们可以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粮票制度定型阶段;二是粮票制度相对混乱阶段;三是粮票制度逐步走向松动并最终消亡。新中国粮票及其粮票制度的兴废,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中共党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也有着与生俱来的鲜明社会特征和时代特征,对此展开研究,有助于把握新中国粮票及其粮票制度的社会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关键词: 新中国;粮票;粮票制度兴废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13)11-047-04

作者: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彭白云,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西,南昌,330022

新中国成立以来,贯穿其中近40年的粮票制度^①,与社会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互动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由于对于新中国粮票制度兴废的系统记载比较缺乏,因此,对其展开深入研究也较为欠缺。本文以新中国粮票制度为研究对象,试图展开进一步研究。

一 新中国粮票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了解粮票制度产生的必然性的重要关节点。就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壮大历程来看,粮票的发行可以追溯到建国前。尽管中共早期票证发行与后来粮票制度的确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而且存在明显区别^②,但也为新中国粮票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历史依据。早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发行了临时借谷证、借谷票以及各类米票。^③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陕甘宁等根据地和华中区、华北区、中原区、晋绥边区、东北地区等解放区都在社会上发行过粮票。据不完全统计,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区票”超过七百种,已成为珍品。这些票证,是中国共产党在粮食供应制度上的有效变革,为星星之火的燎原提供了保障。或许正是由于有粮票发行所取得的历史作用为借鉴,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仍采取了习以为常的粮票制度作为解决粮食供应与购销问题的根本方法。

凭票供应的实质是对紧缺资源的定向、定量的配给制。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严酷的战争结束后作为执政党的重要任务。从中国的国情来看,粮食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或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为应对粮

食供需矛盾,提出并制定实行粮食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是粮票制度产生的现实因素。陈云在1953年全国粮食会议中提到:全国粮食问题很严重。在市场上的粮食销售量、出口粮、军队和机关人员的口粮、储备粮以及库存粮都不能减少的情况下,为避免粮食混乱,粮食差额只能靠统购统销来解决。^④确立粮票制度,一要靠群众和基层干部积极参与,二要牢牢掌握政府对经济运行的集中控制权。因此,在新中国确定中央政府对粮食的管理与供应开始,就是在全国统筹统支的大前提下,略微给予地方机动性。这种掌控经济运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领导经济方式在建国初期的延续。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曾实施过带有战时体制特征的定量供应举措,这无疑是中国学习苏联模式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而且在当时,由于紧张的国际局势和相对孤立封闭的国际处境等不利的国际因素,也加剧了中国粮食供应不足等突出问题的出现。粮票制度正是在这种国内、国际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但是,粮票制度发展为一种与以往或是与当时其他国家不同的一种制度性经济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这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如研究者所说:“票证制度是中国特定背景下历史性的产物,是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化和控制严密化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统购统销长期推行的一种制度上的、认知上的保障”^⑤;另一方面,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统购统销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挂钩时,粮食流通制度则演变成实行经济计划化的重要一环。计划经济不只是一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而且是粮票制度出台的体制条件。在计划经济体制安排下,统购统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因为粮食短缺危机的缓解而停止,反而得到不断加强和完善。

二 新中国粮票制度发展的主要阶段

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粮票制度的确立、发展和取消的整个过程都与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形影不离,有时呈现出一种反向相关趋势。从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国务院制定《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开始,到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粮票制度的发行和管理制度的起止过程大体上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确立统购统销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粮票制度处于定型阶段。期间的三年困难时期属于特殊时段,不再单列出来。

从统购统销“八中选一”的决策过程来看,不难发现陈云在当时之所以坚决主张实行该制度,是在面临严峻的粮食困

难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⑥统购统销政策确立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全国各地(除西藏和台湾外)在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即开始在城乡特别是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⑦到当年12月中旬,统购统销制度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虽然早在统购统销实行前就考虑过会出什么乱子,也曾预计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加之在推行过程中主要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在局部还是产生过一些不当行为,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陈云在农村实地调查后,又提出了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予以补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统购统销的不足之处。正是由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以及不断自我纠正错误失误、不断自我完善政策措施,才促使统购统销这一制度得以长时间执行下去。

为了贯彻粮食计划供应政策,健全市镇粮食供应制度,1955年8月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⑧该办法规定,统销由凭证购买,按户核实,改为按人定量供应,并发行粮票。其内容主要是四证三票制度:“四证”即实行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三票”即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饲料票。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应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发布施行,并报国务院备案。粮食部统一印发全国通用粮票,其余地方票证则由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厅(局)印发。根据粮食部下达的修正“关于全国通用粮票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⑨,各地粮食部门相继印制发行了本地区的粮票,并建立了相应的粮票管理制度。从此,国家粮票和地方粮票(军用粮票不在本文的讨论中)正式进入流通领域,粮食供应走上计划化和制度化。当然,由于国家大地域广,地方情况千差万别,在执行的过程中有快有慢,有先有后,但都按照国家文件要求予以制定并推行开来。

在三年困难时期至“文革”前期,我国粮票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强化。粮食物资越是紧缺,票证越是泛滥,这与历史进程呈现反向相关趋势。在以粮食主食为核心的饮食结构中,困难时期下调的粮食定量难以满足需求,饥饿成为了普遍情况。由于饥饿,营养不良,许多地区相当普遍的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地区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⑩中央通过抓紧粮食调运;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提倡“瓜代菜”;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实行农副产品奖售、换购办法;紧急进口粮食;大幅度精简城镇人口等措施缓解粮食紧张,收到了效果。^⑪这段时期,是粮票管理、发行在地方确立与强化的关键时期。致力于保障粮食供应的粮食管理机构地位更加突显,根据粮票发行配合政策的要求,各种票证铺天盖地地充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这一时期的粮票,都从属于初期统销粮票。

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前,由于政治形势巨变和社会处于动乱之中,粮票制度处于相对混乱阶段。

“文化大革命”十年,各行业正常的经济秩序普遍被打乱。在动乱最严重的三年中,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区经济部门一度陷于瘫痪。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批判,大批经济管理干部受冲击,国民经济基本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⑫据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赵发生所述:在粮食部建立两套班子:大班子

是以造反派为首的大多数人参加搞运动的所谓“抓革命”。其他的副部长有的被“打到”,有的“靠边站”,搞业务的就剩下他了,于是组成了以他为首的“促生产”小班子。^⑬但是,这种致力于力挽狂澜的作用十分有限,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变从中央到地方粮食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组织机构的混乱局面。

在这种社会动乱和管理缺失的形势下,一些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部门容易在政策上被钻空子。粮食部门在当时受到较大干扰,普遍出现亏损情况^⑭,这无疑也加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粮票管理不及时,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现实中粮票的使用期限,使得粮票管理制度更加简化。在粮票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也影响着粮票的发行。如:一些票证(像侨汇粮、油票)的发行就因红卫兵的活动而中止。而且,这期间的粮票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即粮票票面上明显的时代印记。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启动后至粮票正式取消,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粮票制度逐步走向松动并最终消亡。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不断深化,国家对粮食政策和粮食管理体制也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1979年以后,逐步缩小计划管理范围,扩大市场调节比重,逐步开放粮食市场,允许多渠道经营。随着粮食分配和价格的放开,开始只是在不触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因素,将单一的统购统销转向计划定价与市场定价结合的价格“双轨制”。据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⑮规定:自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的任务。粮食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订购以外的粮食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这是统购统销制度取消的重要步骤,也是粮票制度松动的一种表现。之后,国务院批转商业部等八部门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则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

199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⑯,正是鉴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成效而出台的。该通知明确了粮食价格改革的总原则:统一政策,分散决策,分类指导,逐步推进。文件要求,争取在二三年内全部放开粮食价格。这就标志着国家正式取消全国范围的粮食统销。随后,国务院同意了对天津市放开粮食价格的请示,更进一步将粮食购销的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系。随着全国范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依次逐步取消,与此相随而生的粮票制度也走向解体并消亡。按照国家文件相关规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种粮票版本及库存粮票都要按管理权限分期分批先后销毁。从此,粮票就在新中国经济领域谢幕了,粮票制度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 粮票制度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

新中国粮票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凸显出以下五个特征:

一是政府主导。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陈云曾提出在粮食问题上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以及地方跟地方的关系^⑰;并且指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统购统销政策。陈云的主张,在党内得到广泛认可。在统购统销政策中,无论是计划收购、计划供应,还是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以及中央对粮食实

行统一管理,政府的主导作用都是无可替代的。为此,中共中央在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强调,必须做到“全党动手,全力以赴”。在政府主导下,农民的粮食生产以及市镇居民的粮食消费与市场的直接联系都被割裂,伴随而生的粮票制度也被政府牢牢控制。粮食流通管理都由党中央国务院统一规定,地方政府只是在既定的方针政策原则指导和要求下,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但仍需上报备案,以防政策变形走偏。粮票的印发是由粮食部和各级粮食厅、局来负责的。地方粮票的收发管理单位,一般从上到下分为四级管理:市粮食局、区(县)粮食局、粮管所、粮店(站)。所有程序都是在政府的统筹安排下,正常有序运行。由此不难看出,政府主导无疑是粮票制度的最大特征,由此映现出,行政手段是当时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方式。

二是不可交易性。粮票制度的确立,是为国家统购统销政策护航。计划时期的粮票,只是一种购买凭证,它本身并不具备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价值,是不能直接用于交易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粮票,即使有钱,也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买不到所需的物品。因此,国家对于黑市交易粮票是严厉打击的。当然,反过来说,只有粮票,也是买不到东西的,还必须付钱购买。粮票只是粮食交易的一种合法入场券和凭证。在这一点上,粮票制度又体现了计划经济时代票证的一切特点:货币必须和票证配合使用才能购买到商品。这也是它与建国前发行的有价粮票的一个重要区别。当然,粮票“黑市”也随之而来。正是由于这种收益性,让粮票的黑市交易由小部分不法分子的投机行为活跃成为一种政府头痛的社会问题。

三是个体性。这主要是指粮票发放所依据的是社会个体,而非组织,即按人定量的办法。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根据市镇居民的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市镇居民的具体供应差别和每月口粮定量标准。《市政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中就将区域细分为: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和以杂粮、面粉为主食的地区。劳动者也有特殊重体力劳动者、重体力劳动者、轻体力劳动者以及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工,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的区别,大、中学生也是供应对象。年龄划分有十周岁以上,六到十周岁,三到六周岁,不满三周岁,供应量依次递减(每个等级相差五斤左右)。^⑧粮票的具体使用与储存,最终是落在社会个体的身上。即每一个拥有粮票的人都直接与粮票发生联系。

四是时效性。粮票的使用一般都有时间限制,过期作废,作废不补。具体的使用期限则是根据粮食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以北京市为例:自1955年起,北京市粮、面票开始实行按月印制,分级发放,当月有效,过期作废。1968年1月起,改为按月发放,全年有效,但实际上年底并未作废,仍继续使用,成了过期有效。1971年改为按季发放,分月使用,过期有效。相当于取消了使用期限。1975年之后,执行按月发粮票。当年有效,按期清理的办法直至1993年粮票停止使用。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也和北京市一样,对粮票的使用期限也有所要求,具体规定一般都直接印在粮票票面上。

五是身份性。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粮票制度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写照。供应凭证分为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料票七种。严格的户籍制

度不仅限制了农村人口流入城镇,也明确了粮票适用和供应范围。粮食关系与户口紧密挂钩,粮票成为一种身份和权利的象征。值得重视的是,这种身份性的突出之处是,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身份对应不同适用的粮票。在这种语境下,值得一提的是,农民虽是粮食的生产者,却不是粮食的自由支配者,也不是粮食的优先供应对象或特定供应对象,甚至在粮票制度时代,农民是粮食供应的弱势者和奉献人。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农民须得自备粮食出门;在繁重的劳动之下,粮票使用不够,只能以“瓜菜代”,甚至只好被动地忍饥挨饿。粮票制度是那时经济管理甚至是社会管理所亟需,它的对象是社会人,因而不能不重新造就人的身份性差别,并在运行中突出和强化城里人、乡下人以及其他职业性差别。这或许可以看作是粮票的社会附加值吧!

分析这些特征,有助于把握新中国粮票及其粮票制度的社会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首先,粮票及其粮票制度保证了低生活水平条件下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也就意味着在低生产力水平下保障了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就是以不饿死人为底线,虽不能吃饱,但起码不至于饿死。吃饭是人类社会的首要问题。粮票制度是调节粮食流通体制的重要环节,对缓解粮食供需矛盾在当时起到了预期的积极作用。在平衡农业生产基础上,也起到了支援工业建设的作用。

其次,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资源控制是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手段。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资源,粮食短缺使得粮票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由于政府具有整合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功能和特性,通过实施粮票制度,达到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保障供给的经济目的,继而实现稳经济、稳社会、保民生的政治目的,这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建国初期新生的国家政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任何一种新生事物所起到的促进社会变迁作用,要靠实践检验,具体地说,评估粮食及其粮食制度与新中国最初半个世纪的紧密关联度,要看它触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当粮、油、布均需凭票供应时,就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开始步入票证时代。一方面,粮票作为一种发行范围广、时间长、影响深的票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市镇居民出生、婚嫁、死亡等人生重要阶段都与粮票有着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粮票还与当时发行的油票、布票、棉票、烟票等各类票证形成一个社会性的票证网络和票证格局,除它们同时产生社会互动外,它们之间也产生程度不等的交叉互动。以粮票为重要显示度的票证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绷紧着票证神经,产生票证依赖和票证情结。

四 余论

1993年5月,在全国首个使用粮票的北京市停止使用粮票。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已有27个宣布粮票作废。虽然之后还出现过反复,一些城市又重新印发粮票,但是,最终的结局不能改变。粮票退出历史舞台后,仍有零星的粮票散落于民间进入收藏领域,成为现代历史文物。

国家“八五”时期的粮食价格改革,是粮票及粮票制度消亡的重要契机。粮食价格和经营的放开,主要是由于三方面的

因素。其一,农村改革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水平大幅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3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好纪录,高达45644万吨。^①至此,粮食生产压力暂时得到较大的缓解,粮食供应也得到全面保障。其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构日益加速。《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为在20世纪末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提供科学指导。按照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必须稳定粮食增产,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价格、放开经营,加快全国粮食市场体系建设,使粮食生产与市场配置同步起来,良性互动起来。其三,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总体提高,社会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改善和方便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减少甚至取消各类票证,成为一种社会必然趋势和要求。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经济制度;反过来,经济改革也总是与时俱进的。粮票制度的兴起与废止,是适合社会历史法则的通例。

粮票及其粮票制度的产生和废止,并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结果,也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或者形成的一种兴趣偏好,而是一定时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因此,也可以把粮票看作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粮票及其粮票制度的产生和废止,其历程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探索轨迹相重合,在一定意义上说,因粮食供给、管理而出现的粮票及其粮票制度的兴废,又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讲,恰恰是粮票制度的产生与废止,见证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及其理论成果。^②因此,从历史研究“同情共感”的认识角度看,不能简单地说是非正误。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深刻感受粮票的重要性;同样也只有感受到历史进步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到废除粮票的必要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无情,但有时也显得很无情;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但有时也显得很无奈。

注:

①笔者认同粮票制度的产生与废止的区间为1955—1993年。

②具体表现在发行的背景、对象、影响、价值等方面,详见焦连志:《论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票证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解读视角》,《求是》2009年第11期。

③据左进亮、程光敏、左伟:《红色瑞金谷米票探究》,《中国粮食经济》1998年第2期。1933年,以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1934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名

义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以陈潭秋名义签发的各种米票。

④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版,第217页。他说,我们要在农村中采取征购粮食的办法,在城镇中采取配售粮食的办法,名称可以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⑤张学兵:《新中国票证制度的确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增刊。

⑥详见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61页。

⑦贯彻实施的具体做法是:各地以县为单位先召开扩大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接着以区或联乡召开中共党员、青年大会和积极分子大会,然后以乡为单位分别召开中共基层党组织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再召开群众大会。除召开各种会议,层层深入贯彻外,各地还利用其他形式,配合进行宣传。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市政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修正“全国通用粮票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见山西省太原市粮食局编:《太原市粮食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⑩参阅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⑪参阅罗平汉:《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153页。

⑫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页。

⑬赵发生:《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24年》,《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⑭1977年,各省市粮食厅局资金都有亏损,几千万、几亿元的都有,其中以黑龙江省亏损最大,一年亏损竟达10亿。参见赵发生:《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24年》,《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⑮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5年,第9期。

⑯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国发[1993]9号。

⑰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07页。他还说,在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

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市政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报告》[EB/OL]. <http://www.stats.gov.cn/tjgb/index.htm>, 2012-12-15.

⑳参见张艳国:《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比较研究论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唐昌福)

(上接 234 页)

[2]David A. Foote, Timothy B. Folta: Temporary Workers as Real Option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2(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埃米尔·迪尔凯姆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4年版。

[5]约翰·R·康芒斯著:《集体行动的经济学》,中国劳动与

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年版。

[7]胡鞍钢,赵黎:《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4—2004)》,《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8]吴要武:《非正规就业者的未来》,《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责任编辑:南 桥)